



求是书系·传播学

Harmony as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和实生物。”和谐是中国传播理论对国际传播理论的重大贡献，其研究范畴笼括之广也自不待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和谐是常道的体现，也因此而成为传播交流的终极目标。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and
Ideal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e Shi Sheng Wu



“和实生物”

——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

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

“He Shi Sheng Wu” :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and Ideal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辩证大历史背景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传播的中心建立问题上，既需要在强化中心中努力起到中坚作用，也需要在超越中心的进程中大国风范、虚怀若谷。

“He Shi Sheng Wu” :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and
Ideal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求是书系·传播学

Harmony as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and
Ideal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和实生物



“和实生物”

——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

赵晶晶 (J.Z.爱门森) 编译

“*He Shi Sheng Wu*” :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and Ideal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 / 赵晶晶编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8-07905-1

I. ①和… II. ①赵… III. ①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1466 号

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
赵晶晶 编译

丛书策划 李海燕
责任编辑 李海燕
文字编辑 胡 畔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57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905-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和实生物”

J. Z. 爱门森	1
-----------------	---

和谐传播 传播和谐

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

陈国明/J. Z. 爱门森 译	19
-----------------------	----

中国的“和”的观念:对“和”及“和平”范式的分析

贾文山/张园,张晋竹 译	43
--------------------	----

争论过程与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及冲突

迈克尔·戴维·黑森,Rui Shi/郭昕 译	54
------------------------------	----

强调和谐:中国留学生在与新西兰同龄人交流中的心声

普鲁·霍姆斯/张晋竹,张园 译	80
-----------------------	----

调解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

——中国陕西省旬阳县案例研究

贾文山/杨浩,李彦 译	98
-------------------	----

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媒介:传播行为视角

托马斯·雅各布森/J. Z. 爱门森 译	112
----------------------------	-----

互联网与一种传播和谐的意义建构理论

琼·艾特肯,里奥纳德J.谢德列茨基/J. Z. 爱门森 译	127
-------------------------------------	-----

传播与和谐: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媒介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奥巴努阿·阿达·索尼娅/J. Z. 爱门森 译	149
-------------------------------	-----



从传统走向国际的传播理论

中气十足的新生

——推荐从传统走向国际的“气”(Chi, Qi or Ki)传播理论

钟振升/J. Z. 爱门森译 165

组织沟通中的“气”：产生能量流的辩证过程

钟振升/J. Z. 爱门森, 张晋竹 译 169

寻找“气”的西方面孔

——东西方认识框架中对“气”的解释

张惠晶, 陈凌, 钟振升, 理查德·霍尔特/徐偲成 译 185

易经的叙事模式

萧小穗/徐偲成 译 217

对“气”的思考

威廉姆·J. 斯塔柔斯塔/J. Z. 爱门森 译 231

与多学科错综交叉的现代传播

公共服务与市场导向：BBC 和 CNN 对中国反日游行的报道

郑璐, 周树华 241

一场不平等网络战争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黎明生, 孙静 251

中美在全球商务实体领域冲突的解析

琳达·M. 约翰斯顿, 高红梅/吴君 译 286

禽流感电视报道刺激度与观众情感反应和对新闻质量的判断

魏然, 周树华 314

对婚姻冲突中沉默使用情况的跨文化研究

郑婷婷, 查尔斯·塔迪/郭昕 译 326



与国际传播大师对话

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生活与工作

——访加拿大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Harris Bond)博士

常艳荣/J. Z. 爱门森 译 349

多元文化的开拓者

——访前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协会主席贝塔思·霍夫(Bates Hoffer)博士

余 彤 357

从警官成为一名教授

——访前美国国家传播协会主席贝齐·瓦克纳格尔·巴赫(Betsy Wackernagel Bach)博士

侯佳宜/J. Z. 爱门森译 367

一位组织传播学学者的历程

——访国际传播协会主席帕特里斯·巴泽里尔(Patrice Buzzanell)博士

Lin Zhu/J. Z. 爱门森译 375

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性之现代意义

人类传播理论的亚洲范式及其建构

——评 J. Z. 爱门森(赵晶晶)教授译著《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

李东晓 389

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心性在理论及研究

去西方化过程中的作用

三池贤孝/J. Z. 爱门森 译 401

后 记 426



“和实生物”

J. Z. 爱门森

(中国浙江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为笔者所编译的《“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之前言。文中按全书的篇章顺序及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一、和谐传播,传播和谐;二、从传统走向国际的传播理论;三、与多学科错综交叉的现代传播;四、与国际传播大师对话;五、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性之现代意义。五个部分中分别包含论文数篇,本前言对它们逐一展开简介,以期便利本书读者,起导引作用。

【关键词】 中华传播,和谐社会,和谐传播,传统理念,气,易经,阴阳,冲突,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交叉学科,大师访谈,亚洲中心性,去欧洲化,共荣

《“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是编译者继《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Edmondson, 2007)、《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Edmondson, 2008)、《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Edmondson, 2009)等书后的另一国际传媒译文选集。这四本书无论是在成书宗旨目标还是选录论文的标准对象方面都是有计划、有步骤,互为联系补充、一脉相承发展的。而且就编译者的心愿来说,只要条件和身体许可,就希望将这项工作继续发扬光大。确实,在这科技发达的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流动”时代,传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研究人类对传播的理解认识和运用之重要、影响之广远也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由于语言限制和时空距离等原因,国内的一些传播学者还缺乏直接与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交流的机会。本书编译者长期在太平洋两岸间奔走,立意在国际传播理论间的桥梁架构上起一介微力。笔者是在汹涌澎湃、读不胜读的传播理论中遴选、编译成这些书的。这些书的作者们或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人,或为后生可畏的新秀,都活跃于国际学坛。以下按本书的篇章顺序的五大部分,并因循各部分中的主要篇章,略加梳理,以期便利本书读者,仅冀望起到导引作用。



一、和谐传播,传播和谐

“和实生物。”^①和谐是中国传播理论对国际传播理论的重大贡献,其研究范畴笼括之广也自不待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和谐是常道的体现,也因此而成为传播交流的终极目标。这个文化的认知和价值观强调人需要关注自身的修身养性(人内和谐);这个文化的伦理观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人际和谐);这个文化赞赏能群乐群,和力和达(群体和谐);这个文化的理想社会观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③,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④(民族和谐);这个文化憧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⑤,“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⑥的天下大同(国际和谐);这个文化的姿态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⑦、追求“浑然与万物同体”^⑧的民胞物与(生态和谐);同时“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⑩——这个文化的宇宙观是天人相分基础上的交流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看,我们所说的和谐传播,传播和谐的研究应用,可以涵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民族传播、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人与自然之间的传播、人与超自然之间的传播等等各个领域。

事实上,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传播理想境界,应该说是超越局限,可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的。不过尽管和谐是热门词汇,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它在当代国际传播理论中仍然有着远远超出于目前已经被认识到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英文学术期刊 *China Media Research* 为了弘扬中国文化的和谐传播理想,曾经于 2008 年出版了一期和谐专辑。这里的篇章大都是从该专辑中选出的。本部分——也是本书的开篇为美国罗德岛大学陈国明(Guo-

① 《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周礼·天官冢宰》。

④ 《尚书·尧典》。

⑤ 《礼记·礼运》。

⑥ 《礼记·礼运第九》。

⑦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⑧ 程颢：《识仁篇》。

⑨ 《周易·系辞上》。

⑩ 《太史公自序》。



Ming Chen)教授的《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一文(Chen, 2008)。陈教授是美国中国传播研究协会的奠基主席,著述丰厚,在传播论坛中颇有声望。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座教授, *China Media Research* 的合作主编。他既有中国文化学术根底,又受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难得的是他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孜孜耕耘,数十年如一日地做着把中国的传播理论化并介绍到国际上去的工作。该论文从本体论基础出发,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说了和谐之为中国人传播活动的普遍理论。该文以“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力”九个概念为基础,又以西化的严谨的研究方法,总结了4个假设、23条原理和23条定律,竭力尝试将这些概念的功能作用和相互联系建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该文得出了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指导中国人传播行为的准则这样的结论。统观全文,作者努力在国际上去促成对中国的跨文化理解的学人之用心也彰显无遗。笔者以为该论文既可用作典型以了解陈国明教授的学术风范,也可视为国际上介绍中国和谐理论的力作,故置于卷首。

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传播学系主任贾文山(Wenshan Jia)教授的《中国的“和”的观念:对“和”及“和平”范式的分析》一文,认为“和谐”(harmony)与“和平”(peace)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谐”来自于中国文化,“和平”来自于西方现代文化。他在文中将它们进行了比较,指出了西方“和平”思维范式的局限,并认为中华民族的和谐范式在当今冲突四起的世界中应该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甚至提出和谐应该成为新的宗教术语,而传统的自我中心的论调,诸如正义、人权、民主,都应该在相对于和谐的新的自我观念下重新定义(Jia, 2008)。

美国威克弗里斯特大学迈克尔·戴维·黑森(Michael David Hazen)博士和 Rui Shi 博士在《争论过程与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及冲突》一文中说:和谐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关键元素,但和谐、冲突与争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从简单视角探究争论和冲突的本质并不能完全解释其过程(Hazen & Shi, 2009)。通过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普鲁·霍姆斯(Prue Holmes)教授的《强调和谐: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同龄人交流中的心声》,则可以感受到一个西方学者是如何尝试从非欧洲中心的传播理论——和谐出发去做研究的(Holmes, 2008);而在贾文山教授的另一论文《调解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中国陕西省旬阳县案例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与西方现当代文化融合后的创新和现代实践。在争端解决——达到和谐的途径中,



东方和西方体现了相互的学习和借鉴。贾看到东西方的相互肯定在促使双方珍惜自己的传统上所起的作用。认为“在旬阳县以及大部分中国,调解模式正在成为一个西方文化体系和东方文化体系的创造性结合体”;并希望“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所有人都能够从这种解决争端的混合模式中获益”(Jia,2009)。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播理想境界,然而以和谐为社会的理想状态可能并非只在中华文化史上孑然独存,托马斯·雅各布森(Thomas Jacobson)教授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媒介:传播行为视角》一文中声称:“西方对集体福利与和谐的尊重程度有时候要大于其获得的评价,集体价值观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良好的表现。即使是在美国,小镇的价值观也总是显示出对本地方式和集体团结的重视”。他提出了“以公共领域为媒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否能与包含儒家型社会和谐民主相容”这样的西方学者的典型问题。认为同样面对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生活世界殖民化,“东西方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取经的地方还很多”(Jacobson,2008)。

琼·艾特肯(Joan E Aitken)教授和里奥纳德·J. 谢德列茨基(Leonard J. Shedletsky)教授在他们的《互联网与一种传播和谐的意义建构理论》一文中说得很好:和谐并不一定意味着共识,但是和谐却是一种宽容、信任、感知或价值观的同步。如果将和谐视为接受的平衡,那么这种协调就可能通过理解他人信息和对他人信息持有非审判性的开放思想而达成。通过传播去创造相互联系的基础,去影响意义的建构,从而将人们带上通往和谐的途径(Aitken & Shedletsky,2008)。

奥巴努阿·阿达·索尼亚(Obanua Ada Sonia)博士的《传播与和谐: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媒介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本部分的最后一篇选文(Sonia,2008)。对非洲传播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特选其本土研究篇收录于此书中,以示和谐传播、传播和谐过程中绝对不能忘却这片辽阔的有声有色的传播土壤。

和谐传播、传播和谐部分在全书中占分量最重,唯其如此,故置于书首,并以其冠全书之名。

二、从传统走向国际的传播理论

作为群经之首的古老的《易经》,及其众多衍生概念如“阴阳”、“气”,等



等,正从传统迈向国际传播论域(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本书第一部分与和谐相关的诸多研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从传统走向国际的传播理论的最好例证。分开罗列,完全是为了全书组织的方便)。如众所知,这些经典概念贯穿渗透了东亚哲学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成为东方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着当今的学术领域;无论从宇宙论、本体论,还是从方法论、现象学来看,莫不如此。相关的研究中人物荟萃,论题层出不穷,方兴未艾。在这类研究中台湾的学者尤其显得活跃。

本部分中采撷了论文五篇。先介绍的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钟振升(Jensen Chung)的《中气十足的新生:推荐从传统走向国际的“气”(Chi, Qi or Ki)传播理论》和《组织沟通中的“气”:能量流产生的辩证过程》两文。我们的2008年第3期*China Media Research*中包含了一个“气”传播理论特辑,钟振升教授是该辑的特约编辑。这里的前一文即为该辑导言,其中简介了辑内有关“气”传播理论的诸篇论文。钟教授本人在气理论的走向国际方面颇有建树,除了本书所选的两文,我们的*China Media Research*还发表过他的另一有分量的《公共关系,〈易经〉和“气”理论:一种古老哲学的新模型》(2009, Public Relations, *I-Ching*, and *Chi (Qi/Ki) Theory: A New Model from An Old Philosophy*. *China Media Research*, 5(3), 94-101)一文,可惜这里因篇幅关系没能收录。这些论文倾力介绍传播的“气”(Chi)的理论,运用物理学、生理学以及认识论(epistemology)的理论来解释“气”的概念。力图通过这样的科学阐释,以使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对这个理论有所理解。在阐明“气”的定义以及提出沟通中的“气”的理论假设后,作者又引进“势”(shih)的概念来解释阴阳互相作用以生“气”,还一一分析了《易经》中的某些认识论对如何组织外部沟通(或公司交流、外部公共关系)所能有的启示(Chung, 2008),如此种种,可谓用心良苦。

本部分第三篇是钟振升(Jensen Chung)教授与伊利诺斯大学张惠晶(Hui-Ching Chang)教授,香港浸理会大学陈凌(Ling Chen)教授,北伊利诺斯大学理查德·霍尔特(Richard Holt)教授合作写出的《寻找“气”的西方面孔——东西方认识框架中对“气”的解释》。该文使用多维量表法(MDS),通过对中国和北美人群的调查,探索他们对“气”这一有关能量流动、活力、精神和尊严的概念之不同认识。有关“气”观念及对各种因素的认识所存在的种种分歧,能有助于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中影响人际交流的元素进行研究和理解。另外,对“气”这一观念统领下的这些术语的解释所产生的各种差异,还



能让我们了解到文化是怎样对精神层面上的传播机制进行塑造和定义的。而正是这些精神层面,反过来引导着我们的日常交往行为(Chang, et al., 2010)。紧接着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萧小穗(Xiaosui Xiao)教授的《易经的叙事模式》一文,则关注了《易经》的叙事结构,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叙事结构的特点,帮助《易经》成为了中国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讲述关于命运的各种变化的故事的著作(Xiao, 2009)。以上这些论文在表现出作者们把中华传统精华思想介绍给国际学坛的热情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即便在涉及介绍东方文化时——所受过的西方传播学训练,以及在使用西方研究方法时的娴熟自然。

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国际的传播理论得到的是怎样的反响?西方传播学会怎样来接受这一新理论呢?本部分中的最后一篇、美国霍华德大学威廉姆·J. 斯塔柔斯塔(William J. Starosta)教授《对“气”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范例。斯塔柔斯塔教授是霍华德传媒学刊创建人,跨文化传播学科负责人,著名跨文化修辞学研究家。曾赴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台湾等地的亚洲大学学习研究,对东方文化有浓厚兴趣和修养。他在该文中指出一些著书立说的理论家们只看到最接近于自身的行为做法,再给这些默许的知识加上量化证据,而这些量化证据的衡量只以与他们自身文化很类似的人群为标准(Starosta, 2008)。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课堂上教授的、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传播理论实际上是片面而不完整的。他一向呼吁一种文化应该被各种不同的“外人”视角所观察,从而获得更为充分且丰富的解读(Starosta & Chaudhary, 1993; Starosta & Chen, 2003, 2005; Starosta & Shi, 2007)。在该文中他也自谦因为他所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训练,仅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提供一种“客位”(etic)观点。而诚如钟振声所说,斯塔柔斯塔教授“大概是第一位接触并理解此理论的西方传播学者”。他的评论“深刻而坦诚,具有艺术性”,在对于中国古老的“气”的思索过程中,“他的西方式理解在学术上和历史上都将具有很大的意义”(Chung, 2008)。

三、与多学科错综交叉的现代传播

应该说,传播因为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和基本社会功能而牵涉广泛,凡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都可加盟其中: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新闻学、国际关系、语言学,修辞学——而且用现代眼



光看来,这些学科知识在研究人类传播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中已经充满了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传播学家们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可以说它在胚胎期就已种下了与多学科交叉的根源了。传播的特性又决定了其发展必然与时代的信息化相应,自人类进入以电子传播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后,由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媒经济的空前壮大,它需要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统计学、数字学等自然科学中继续吸取养分,并不断被要求用其他学科的最新原理、理念、方法来解决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天,与传播相关的已经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和平共存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传播研究的范围、方法、影响、作用不得不顺运委化,它所肩负的责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在这一进程中,虽然有学者为传播学的学科纯粹颇费心力,传播学作为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时时伴随着在多学科交融中失去重心、消失“自我”之虞。无论如何,传播学科在壮大中不断吸取各种学科的营养乃不争之实。我们宁可相信,极强的兼容性并不意味着其生命的终结而恰恰体现其茁壮的生长力。况且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传播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现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从精细分类逐渐回归融汇交合的科学人文趋势。

本部分共精选了六篇论文,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郑璐(Lu Zheng)博士和周树华(Shuhua Zhou)教授的《公共服务与市场导向:BBC和CNN对中国反日游行的报道》一文,研究了新闻报道的两种导向——公共服务和商业化——对新闻内容的影响。通过科学统计方式,该文的两位作者发现CNN所推崇的面向大众市场的新闻报道模式含有更多的戏剧性的元素,并且运用更能引发移情的新闻框架。与CNN相比,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BBC在其新闻报道中很少使用戏剧性手段,并采用更为中立的新闻框架(Zheng & Zhou, 2009)。毋庸置疑,如何通过全面而又精彩的新闻故事来保持甚至提高媒体公信力,仍然是所有新闻工作者的巨大挑战。该文对于报道风格的研究结果值得引起学界的注意,也便于今后通过测试注意力和学习过程方面的认知变量,来获知不同报道风格的新闻能否影响新闻受众对新闻本身、新闻可信度以及新闻机构的评价。

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黎明生(Mingsheng Li)博士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孙静(Jing Sun)教授的《一场不平等网络战争中的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研究了在西方媒体报道“西藏暴乱”的热浪中高涨起来的中国网络民族主



义。由于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中国网民对西方主流媒体逐渐失去了信任和信心,他们使用网络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吐露他们的心声和传播信息,鼓动并汇聚了上百万中国民众,转而支持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危机中的立场。西方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在西藏和人权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西方抨击中国的活动反而巩固了中国的地位,刺激并加强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而且还教育了一支强大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大军(Li & Sun, 2009)。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的琳达·M. 约翰斯顿(Linda M. Johnston)教授和高红梅(Hongmei Gao)教授的《中美在全球商务实体领域冲突的解析》一文,主要通过与美国企业中的中国求职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对美国在华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案例调查,来研究中美企业在冲突管理风格上的差异,并尝试解析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可能会引起误解和冲突的因素。琳达·M. 约翰斯顿教授是其大学冲突解决研究中心、冲突管理科学硕士课程主任。该文认为来自特定文化背景的个体或公司应该调整他们的冲突管理方式和策略,以适应未来我们工作的全球大环境,并提出这个领域还有大量的研究有待进行(Johnston & Gao, 2009)。

南卡罗来那大学魏然(Ran Wei)教授和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周树华教授的《禽流感电视报道刺激度与观众情感反应和对新闻质量的判断》一文,通过科学实验方法考察了报道信息的刺激度(arousal)是如何影响观众对 CNN 禽流感相关报道的看法的(Wei & Zhou, 2009)。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郑嫔嫔(Chuan-chuan Cheng)博士、查尔斯·塔迪(Charles Tardy)博士《对婚姻冲突中沉默使用情况的跨文化研究》一文,则通过对 146 名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已婚人士的调查,研究了文化和性别对婚姻冲突中沉默使用情况的重大影响(Cheng & Tardy, 2009),其研究结果对诊疗和婚姻冲突咨询有实用性。

这六篇论文在反映传播的跨学科特性上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窗口。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它们在内容上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国际关系、语言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多方位的重叠交叉,对海外传播学论文中多种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也可略窥一斑了。

与国际传播大师对话

本部分收录了加拿大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Harris Bond)博士(Chang, 2009)、前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协会主席贝塔思·霍夫(Bates



Hoffer)博士(Yu,2010)、前美国国家传播协会主席贝齐·瓦克纳格尔·巴赫(Betsy Wackernagel Bach)博士(Hou,2010)和国际传播协会主席帕特里斯·巴泽里尔(Patrice Buzzanell)博士(Zhu,2009)的四个访谈。或许有些学者认为大师访谈不一定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内容,对这样的看法,本书编译者显然不敢苟同。

首先,通过这类访谈,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实用的信息。在本书收录的访谈内,如对彭迈克教授研究成果感兴趣者,可根据其访谈中的指示,针对性地得到其相关著述信息。需要使用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博士项目声誉排名研究的,可以在巴赫教授的对话中得知些内幕。如果对传播协会委员会(CCA)还不熟悉,巴泽里尔教授的解释会让你知道 CCA 是一个协会联盟,其下有 8 个协会,总部位于北美。该协会把学科的整体提升和面向全体成员的资源整合作为其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如果有意了解国际传播协会(ICA)的运转模式、宗旨和近期的学术活动,这里的访谈也能提供机会,使你得知国际传播协会是把传播学科的国际化作为其工作中心的,甚至你能从中得知该组织对新学者的欢迎态度。此外如美国传播学研究并开设课程教授如何与濒临死亡者沟通、如何让科学家增益传播技能等,都或可为国内相关部门提供借鉴作用。

其次,通过这些活跃于国际的传播学者的访谈,我们可以感受观察到现当代国际上传播的主流研究趋势,对传播研究主流的领先人物关于传播领域的未来发展的想法有基本了解。巴赫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说:世界正在迅速地变化,Facebook、Twitter 及其他社交媒体现在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她还说传播协会委员会(CCA)和其他协会——如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国际传播协会(ICA)、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广播教育协会(BEA)和国家广播工作者协会(NAB)等大型传播协会如今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新世纪的传播研究对策。庞大的国际协会的组织者们意识到由于媒体的爆炸,传播领域处于从未有过的错综交叉的状态下,认识到必须联合力量面对全新的媒体世界。而从这些访谈中我们感受到目前传播学科既要联合其他学科应对新形势、新需求,又面临把传播学科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挑战(本前言前一部分论述正与此相应);同时,今后国际的研究将会更注重有个人交流根植于内的相关的宏观论述;将会更重视那些针对信息,能够在考虑到文化和其他背景因素的情况下去设计干预措施的研究……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这些领头人——尽管他们自身



是欧美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截至目前的大部分传播研究与教学工作以西方为中心的问题。正因为此,巴泽里尔教授在她被访时说:在新研究计划设计的时候,将会有所反思,并已经准备好进一步的东西对话。她提出:在目前的全球社会中,为了让传播研究能拥有一种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应该朝获得更好的“全球能力”和“文化智力”的目标而努力。当然,我们也不会错过彭迈克教授在其访谈中的呼吁,他认为现在是抛弃西方的那种感觉过于良好的自负心态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互相依存,不可分离”;霍夫教授也申明: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协会(IAICS)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仅仅从一个视角来审视多元文化。从其访谈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竭力主张通过跨文化合作来加深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以上种种,都直接反映了当代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向,认清这些,有利于中国传播与国际接轨。

再次,通过这些国际著名传播学者的访谈,我们还可以从对面观测到他们对目前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国际学坛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传播学无论是在学科基础还是在发展路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教授传播领域——比如组织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时,西方的学者再也不能仅仅依赖、参考西方的资源和枢轴关节。国际传播界将逐渐开始期待中华传播能贡献一些带有启发性的新视角、新力量和责任心。这也是令人鼓舞的。

当然,通过这些访谈,我们还可以了解当代主流传播学者的治学态度,分享其作为成功的国际传播组织的领导人、传媒研究者、导师和教师的个人经历,分享他们之所以在其领域能有出色建树的经验和关于传播学科的真知灼见。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可以得知他们自己对其导师、对与优秀学者交流的重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细节,乐于与众多国际学者合作,对学术建树过程中帮助过他们的人持感恩心态。在笔者看来,这几位受访的著名学者们都有共性:他们都生活在紧张有序,塞得满满的日程中;他们都看起来精力充沛;他们好学谦虚,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是扎实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传播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访谈往往更体现人性。通过本书收录的这些访谈,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学者们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甚至包括他们的兴趣爱好:得知他们也会为不想从事学习的学生而沮丧,得知他们也有过被退稿的经历,这些都使读者易于认同。这四位学者中的两位男性学者都已经是当祖父的人了,或许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已经应该是养花、打太极拳的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他们还是雄心勃勃,有着许多计划。两位女性学者除身负要职外,还



带有许多研究生,有多个研究项目在进行。她们是研究者、教师、管理者,同时也是妻子,是母亲。现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的帕特里斯·巴泽里尔博士甚至有六个孩子——这意味着大量的事务和许多精力的需求,对一般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同年龄段的学者们来说可能会有些难以想象。巴赫博士的生活更是令人惊异和充满意想不到的经历,一个警官为何、如何寻求传播学的博士教育,最终成为一个教授,并成为美国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协会之一——国家传播协会的主席,还自称喜欢处理家庭纠纷……这些对我们尤其是对年轻学者应该有积极的激励和导引作用。

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性之现代意义

本书最后部分是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性之现代意义。这一部分的主题可以说是本人所编译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和《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两书的最直接的承继发展。两书出版后得到了有关学界的重视,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曾围绕中心问题举办过几次博士论坛,引发了一批年轻学子的进一步思考探索。我们的学术刊物 *China Media Research* 今年7月期内又特邀陈国明教授和三池贤孝教授主持了一个专辑,辑录了数篇更深层次探讨传播的亚洲中心问题的发人思索的精彩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是由来自尼泊尔、日本、斯里兰卡、印度的有影响力的学者们写成的,可惜本书还来不及收录。传媒理论的亚洲研究学派在国际上影响日益深广。本部分仅收录了浙江大学李东晓博士的《人类传播理论的亚洲范式及其建构——评 J. Z. 爱门森(赵晶晶)教授译著〈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Li, 2009) 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三池贤孝教授的《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亚洲中心性在理论及研究去西方化过程中的作用》(Miike, 2010) 两文。笔者相信有心的读者们对此研究的方向已经比较熟悉,故将此两文的精粹之处,留飧读者们自己,此处不再赘言。本编译者唯一想借此前言再强调一下的是: 西方的先行学者们已经在倾听并关注亚洲学派在国际论坛上的大声疾呼,前面的著名学者访谈和所选西方学者的论作中无不证实了这一点。对传播学中的西方绝对压倒之势和以偏概全显然需要纠正,但无论是非洲中心主义、亚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其他种类的中心主义,都有可能妨碍国际对话,造成文化隔阂,这样的结局也非国际上的亚洲学派的智者们之所愿。而编译者在上一书前言中已经指出过,特在此进一步地强调: 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与多元